走进新时代的深切呼唤，是履行新使命的迫切需要，更是人民军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走在前列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少将）  
　　实战实训要处处兴实风  
　　西部战区空军保障部  张凤强  
　　开训即开战，动员即誓言。习主席在中央军委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上发布训令一个月来，全军官兵以打赢姿态进入打仗状态，开启“战场模式”，不为刻意打造新亮点，只闻实战化训练硝烟味，全军上下呈现出大抓军事训练强劲态势。  
　　实战化训练绝不能虎头蛇尾。持续兴起大抓训练热潮，是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不是插彩旗、挂横幅、敲锣打鼓、嘴上喊喊就能实现的，而应不骛于虚声，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力推动训练实践向战场靠拢、向打赢聚焦。  
　　实战务求实训。持续兴起大抓训练热潮，就是要处处兴实风，时时在状态，把新军事训练大纲贯穿演训全程，以高“含战量”训练找准问题差距，以高“含金量”训练推动能力提升，最大限度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实现训练场与未来战场无缝链接，在不断学习对手、研究对手中设计未来战争，赢得未来对手。  
　　  
　　打造尚武强能的军营文化  
　　武警吉林总队白山支队  姜祖伦  
　　《亮剑》中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画面，一支部队被打得弹尽粮绝时，被炸弹炸得深埋土里刚被挖出来的连长，一边清点人员，一边准备拿起武器战斗，同时组织大家唱军歌，最后点燃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军歌在硝烟中升腾，而壮士却一去兮不复返了。军歌是战斗的号角，在革命军人眼中，每一种战斗文化都能成为浴血沙场的动力源，引领他们舍生忘死、精忠报国。  
　　军队是一个心无旁骛谋打胜仗的群体，其文化圈必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以尚武、奋斗、务实为主基调，引导官兵精武、战胜雄师劲旅。军营的尚武文化，核心是精武强能。要把爱武尚武精武教育纳入常态，通过平时点滴渗透、训练讲评表扬典型、集中教育讲典型战例和英雄故事等方式，将爱军习武持续注入官兵神经；要设立“精武英雄榜”，把各级在比武竞赛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照片和事迹放到荣誉室，放在灯箱和宣传橱窗等显著位置，作为重要典型宣传与宣扬；要持续开展“当尖兵、破纪录”活动，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通过高手对决和强手交锋，让官兵明白训无止境、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  
　　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列装空军作战部队的消息一出，举国上下群情振奋。为进一步了解歼—20战机相关问题，近日，记者对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志作了专访。  
　　记者：歼—20战机列装作战部队，这在中国空军发展史上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明志：歼—20隐身战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对空军转型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  
　　二是标志着空军显著提升应对新型空天安全威胁的能力。目前，空天安全威胁事关国家安全全局。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美军频繁派遣隐身战机在我前沿部署。同时，日本、韩国和印度也在大力引进和发展隐身战机。中国空军迫切需要提升应对空中隐身威胁的能力。歼—20隐身战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展示了空军为维护国家空天安全提供的力量支撑，改变了以非隐身飞机和地面防空系统对抗隐身战机的态势，有效应对隐身战机威胁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三是标志着空军主战航空装备体系进一步充实完善。歼—20隐身战机列装，改变了空军作战部队主战航空装备的构成，开始逐步形成“四代装备为骨干、三代装备为主体、信息装备为支撑”的装备体系结构，大大加速了空军“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步伐。  
　　四是标志着空军的常规威慑与打赢信息化空中战争的能力有明显提升。歼—20隐身战机作为空军的新一代隐身战机，具有在空战场“先对手发现、先对手攻击、先对手摧毁”的能力，可以对对手的非隐身战机形成压倒性优势，对那些试图威胁我国安全的现实与潜在的对手构成强大的空中威慑力与打击力。  
　　记者：自主研制歼—20战机，主要突破了哪些技术瓶颈？  
　　王明志：歼—20隐身战机是新一代隐身战机，也是我国航空工业研制的第一型隐身战机，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循。同时，隐身战机的设计与制造涉及航空装备研发的高端技术，甚至是一些战略性技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会在这个领域向中国伸出援手，可见隐身战机的研发对于中国航空工业人来说困难之大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中国航空工业人凭着航空报国、科技强军、克服万难的一腔热血，凭着在研制多型第三代战机的复杂艰巨工程中锻造出来的一支高素质、特别能战斗的全体系工程研发力量，凭着国家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和雄厚科技实力，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以比其他航空强国更短的时间，研制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隐身战机，这一突破不仅是中国在尖端航空装备上零的突破，更是中国在高端信息化装备研发并形成具有创新性比较优势方面的战略性突破。  
　　记者：歼—20战机的列装，是否标志着空军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王明志：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现代化战略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是空军官兵的强军信念、强军梦想和不懈追求。空军紧盯世界一流发展目标，围绕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着力提升了空天战略打击、空天防御和空中战略投送三个方面的核心能力。歼—20隐身战机研制成功并交付空军后，在专门的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先期试装试用，检验新一代隐身战机的能力，摸索新装备运用特点，并在体系对抗演练中验证和提高体系作战能力，为新一代隐身战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歼—20隐身战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标志着空军在贯彻落实“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要求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1917年12月21日，海因里希·伯尔降生于德国科隆一户殷实的手工业家庭，后家道中落，举家搬至普通居民区，与工人阶级的孩子结下天然的深厚友情。中学毕业，他成为一名书店学徒，不久进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初试文学写作。不过半载，作家梦便被入伍令打破。他成为一名情绪不高的二战士兵，上过前线，蹲过战俘营。1945年，他重返满目疮痍的科隆，以写作为终生之业。  
　　起初，伯尔也经历过数次毁约退稿，发表的短篇故事反响平平。1951年，他应邀登上作家组织“四七社”的朗读讲坛，短篇小说《害群之羊》获得作家们的当场认可，俘获他们的主要是一种富于创新性的写作方式，一种幽默的叙述语调。  
　　1952年，在《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中，伯尔再次谈到“幽默”一词。他认为，作家应该具有狄更斯那般善于观察的眼睛，“要用人的眼睛来看，这眼睛平时既不太干，也不太湿，而是有点潮润——‘潮润’一词在拉丁文中即为HUMOR。”作家伯尔的幽默感集中显现在他笔下的叙述者身上，他们与所述内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他们的言词没有引人大笑的感染力，却透着窘迫和无望带来的滑稽感，如同小丑面具上的泪滴，指向人性的忧伤。  
　　从“四七社”开始，伯尔成为联邦德国战后代表作家之一。接下来的20年，他的创作态度日趋鲜明，创作风格日趋成熟，多部长篇代表力作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包括《莱尼和他们》。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德国战后作家，以嘉奖他在这部小说中展示的杰出的文学塑造能力和强烈的历史意识。  
　　“独立斗士”：  
　　于他十分贴切的名称  
　　回顾伯尔的一生，他身上的标签与所获殊荣一样繁多：科隆好人、西德良心、道德作家。有几次伯尔承认，“独立斗士”是一个于他十分贴切的名称。  
　　二战结束，当身心俱疲的德国人遁入“内心流亡”文学所营造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时，伯尔提出“废墟文学”的口号。他不愿加入捉迷藏的游戏，不愿把眼睛蒙上。他透过身负重伤的年轻士兵的目光，回视战争如何开始（《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他透过重返前线战士的内心，描画出终点站台上不可见的死神（《列车正点到达》）。  
　　当有人嘲讽伯尔的早期作品弥漫着洗衣房的潮腐时，他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洗衣房以及活动其中的小人物就是联邦德国战后不可回避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日常生活破败不堪，如长篇小说《一声不吭》《无主之家》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他们有资格、有理由成为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对象。  
　　当经济奇迹带来富裕的物质生活，当德国民族日益陷入历史健忘的集体病症时，伯尔选择在作品中（如《九点半的弹子戏》）执着地回忆过去，安放令人不悦的历史“倒钩”，埋下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索。  
　　面对从纳粹政权到阿登纳政府以来，宗教与政治暧昧不明的纠葛，面对天主教会对信徒的屡次背叛和无视，伯尔不仅在《小丑之见》等作品中，利用人物的目光审视宗教政治化、机构化的现状，更在1976年毅然宣布退出作为公共权力实体的罗马—天主教会。  
　　面对媒体权力的日益膨胀，伯尔借助对德国红色旅（RAF）的讨论，揭开政治与媒体的共谋实质，警示人们注意媒体社会中潜在的“新法西斯主义”，为此一度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对于舆论暴力的思考也成为其晚期小说代表作《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主题和架构。  
　　伯尔就是这样一个不顺从的人，总是对时代弊病做出最为直接快速的诊断，将各种可疑的权力联结曝之于众，对暴力的各种变形发出警示之音。  
　　“人道美学”：  
　　道德与美学的一致  
　　时至今日，对于伯尔的质疑之声仍然不绝于耳，特别是对其作品内在文学性的质疑。不少批评家认为，伯尔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多来自道德因素，而非作品的美学特质。在发表于1964年的《法兰克福演讲》一文中，伯尔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并称之为“人道美学”，即内容与形式的和谐，道德与审美的一致。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伯尔将这句话改为：“奥斯维辛之后，就连呼吸、吃饭、恋爱、阅读都变得难以为继。谁要是开始呼吸，并点燃一支香烟，那他是下定决心要活下来。”伯尔决心寻找一种适于安居的语言。这是一种有别于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是要在现实和语言的废墟上，从零开始，重建故土家园、重建人际关联、重建生活根基的文学语言行动。  
　　以短篇小说为起点，伯尔开始了艰难的语言重建行动。在他看来，短篇小说这个文体完美贴合了那个时代短促急速的呼吸节奏，也适于收纳琐碎零散的生活片段。他的作品将德语短篇小说推上了艺术的巅峰，也展示出不同寻常的个人创作天赋。  
　　伯尔在“垃圾一般的日常”里，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人道美学”的发生场。“显然，文学所能选择的对象，只可能是被社会宣布为肮脏无用的垃圾。”劫后余生的德国小市民，连同他们矗立其上的废墟，就是这堆“垃圾”。伯尔以充满人道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赋予他们文学价值，为他们创造寄寓之所。  
　　20世纪50年代初，伯尔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的作品具有一望而知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并不落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窠臼。伯尔嘲笑那种上气不接下气、跟在现实后面狂追不舍，并把它当作真实的人。  
　　他说：“谁想射中飞鸟，就必须静静地瞄准，冷静地坐在那将过去与未来隔开的秒针上，必须勇敢地向那只小鸟即将飞入、处于射程之内的真空射击，从而使真实落入自己的手中。”真实并不与现实同步，它位于比现实更远一些的地方，并且总是在运动。因此，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就是要沿着现实的指针，在想象的真空中，延伸真实的虚线，勾勒真实的虚像。  
　　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伯尔构建文学真实的秘密就隐藏在日臻成熟的叙事技巧中。在他的小说里，不难发现各具个性的叙述者，他们与所述内容保持距离，对其加以嘲弄讽刺，或是对人物提出自以为是的批评。读者受到这种强烈主观化感知视角的操纵和限定，失去了现实的稳固根基，必须重新审视各种意识形态或有约束力的价值所设定的价值标准，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这种指向叙事者的自反性，充分体现了小说的文学现代性，它实际传达着一种对现实的怀疑。  
　　有人说，伯尔的文学作品过时了。但在全球化的迁移浪潮中，在语言中寻觅安居之地、寄寓乡愁的艺术探索永不过时。在后现代解构思潮未尽的余波中，对人道主义意义与价值的坚守永不过时。在人类远未走出自身困境的现时代，人道主义美学永不过时。  
　　每个热爱艺术的人徜徉在博物馆中，都渴望与古画能有“亲密接触”。然而，古代画作是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有效保护，需保存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令许多观众与之缘悭一面。  
　　近年来，数字技术与古画修复实现了“跨界合作”，“唤醒”了沉睡的古画，让它“活起来”“动起来”，甚至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时光穿越感。技术的进步还让沉睡的古画有了替身，有效缓解了古画在保护和开放方面的矛盾，在保护真迹、弘扬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数字化的“传移摹写”在画面内容、修残补缺上的还原程度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准，但技术的有限性令复制品与原作间仍然存在差距：在材质上，古画真迹的颜料，如石青、石绿、朱砂等都是从天然矿石中提取，纯度之高、精度之细，堪比顶级珠宝，复制品的色彩显然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平；其次，古画具有的“精气神”，是古代艺术家注入画面的艺术气息，承载着人的艺术思想和实践活动，这是机器印刷所无法比拟的。  
　　日本科研团队近来研发出的新复制技术，通过突破印刷技术上的局限性，融合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人工传统绘画技术，使复制品具有更接近原作的真实感。目前，已复制再现了包括敦煌第五十七窟壁画、克孜尔第212窟壁画、巴米扬东大佛天井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以及一些浮世绘和油画等珍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第五十七窟壁画是我国初唐时期、距今约1400年左右绘制的佛教绘画。边长不足5米的方形窟内保留的精美壁画，尤其是南壁的菩萨，曾被已故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称为“东方维纳斯”，在日本声誉极高。  
　　然而，要想一睹“东方维纳斯”的艺术之美却并非易事：日本与敦煌距离遥远，且为保护壁画，石窟有可能被关闭。2017年，研究团队利用新的复制技术将五十七窟整窟进行原样复制，首次实现壁画与石窟空间环境的真实再现。观众走进展厅里的“石窟”，通过近距离欣赏壁画和雕塑、触摸土质壁画的斑驳感和“东方维纳斯”头饰与服饰上沥粉贴金纹样，全方位感受初唐佛教的艺术魅力。  
　　从实际展出效果来看，复制品不仅是原作艺术表现性的替身，其可触可摸的特点更允许近距离鉴赏，增加了展品与观众间的互动。对于那些不可移动的壁画来说，复制技术让其真正“活”在世界观众眼前。  
　　2001年，阿富汗巴米扬壁画被炸毁，世人再无缘看到这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但保留下来的许多照片与数字技术和传统绘画的融合，让巴米扬东大佛头顶的巨幅壁画重现，让原本已经消失的世界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传承。  
　　文化遗产的意义跨越国界，烛照历史，连接未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它们也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技术进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继承与弘扬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支持，数字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华沙老城有许多景点，如美人鱼雕像、王宫和居里夫人博物馆等，其中长方形集市广场是华沙的地标，18世纪前一直是城市中心。如今广场周围遍布餐馆、礼品店和咖啡馆，每逢周末，原本穿城而过的老城公交车会改道而行，这里随即变成步行街，成为孩子和街头艺人的乐园。  
　　城堡广场与老城广场一步之遥。穿过有些逼仄的小巷，路过林立路边的教堂，忽然一片明亮的景观进入眼帘——这就是更加开阔的城堡广场。过去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尽，如今广场已成为民众休闲游玩的场所，和平带来了安详与静谧。  
　　漫步华沙老城，脚踏凹凸不平的铺石，看到斑驳的墙面和屋顶上颇有年代的瓦片，以及街头的陈旧木椅，一切都显示着城市的古老。假若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城市最初建立时所修，便已被眼前景物的沧桑所误导，其实这一切都来自重建。  
　　华沙城坐落于中欧诸国贸易通商要道上，有800多年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沙有86万人丧生，超过85%的建筑物被摧毁，957幢战前被列为文物古迹的建筑仅保留下34幢，其中782幢完全毁坏，曾经富丽堂皇的古典建筑荡然无存。  
　　一些人断言，战前的美丽华沙已无法重现。然而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波兰人民奇迹般地恢复了华沙城的原样，重新获得了失去的记忆，凝聚了民心，维护了民族尊严。华沙的毁而不灭，不仅是历史建筑的重建，也是民族精神的重生。  
　　1945年2月，华沙成立首都重建办公室，民众争相向政府提供战前的老照片、风景画册、明信片，还有按照老人回忆建筑风貌记录的图纸，资料总重达几百吨。二战前，希特勒曾威胁吞并波兰，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预感到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便对华沙城几乎所有建筑和街区进行了全面测绘。他们不仅详细绘制了街道位置、建筑物立面造型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几乎将古城的每个细节都精确记录下来。战争爆发后，他们不顾危险继续测绘，并从市建筑部门大楼内抢救出大量历史资料，藏在一个修道院的古老石棺里。正是这些资料为华沙重建提供了重要信息。  
　　1947年，华沙重建工作正式启动，政府组织人力和资金，对20世纪30年代外国占领波兰以来的建筑进行美学和文物价值方面的甄别，希望重建后的城市建筑能够体现华沙主要历史时期建筑的风貌。1年3个月后，城市中的广场得以重建，随后一些历史建筑也被陆续修复。不到3年时间，华沙城基本恢复原貌，那些宫殿、教堂和城堡重现昔日的巍峨壮观。  
　　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规则原本拒绝接受重建的“遗产”，而华沙老城，一座二战后重建的城市，却在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特例也是奇迹。打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是波兰人民保护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精神。  
　　  
　　制图：蔡华伟  
　　2017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又一次沿京都七条大道一路向东疾行。过鸭川，人流渐紧，路灯和沿街店面招牌上，临时加挂的招贴字幅也愈发密集起来。那招贴上径书两个大字：国宝，外加一行“通关密语”——41年梦8周。正是这口号引得四方人流奔涌，待汇聚到京都国立博物馆前时，已成骈肩杂沓之状。  
　　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开馆120周年之际，馆方筹划了日本41年来最高等级的特别展览会。展品有210组，全部是日本政府公布的国宝。在日本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里，国宝是最高等级，截至2017年，共有223组不可移动的建筑物和885组可移动的美术工艺品被指定为国宝。换言之，1/4可移动的日本国宝都在此次京都大展上现身。展期不过8周时间，个别展品甚至只展出一周，如此说来，“41年梦8周”的口号还真是恰如其分。  
　　当然，我感兴趣的重点是日本国宝里的中华文物。按照日本方面的划分，其国宝中的美术工艺品又具体分作绘画、雕刻、工艺品、书迹典籍、古文书、考古资料、历史资料等7类，前6类中都有中华文物的身影。在此次日本国宝大展中，明确为中国传入的就多达48组，约占全部展品的1/4。我记忆最深的是，展品虽然均为日本最高等级的国宝，但关注度仍有高低差异，其中最热门的两件展品全部来自中国，分别是第二期出陈的曜变天目茶碗和第三期出陈的汉倭奴国王金印。为疏导人流，馆方特别在展厅内设置了单独的参观路线，引导观众专门排队近距离观看这两件奇珍异宝。  
　　1784年出土于福冈博多湾志贺岛的汉倭奴国王金印，长宽高都不过2.3厘米，堪称是最小的日本国宝了，即使贴近展柜辅以微距望远镜端详，也难以看清印上蛇纽真容。尽管微小，但它印证了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57年赐倭奴国印绶的史实，堪称中日交往初期遗存至今最珍贵的文物。至于曜变天目茶碗，出自南宋建窑，宋元时传入东瀛，成为茶道的无上至宝，其中列入日本国宝的共有三件，此次展出的是最难得一见的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品。贴近展柜观赏这直径不过12厘米的茶碗，内壁黑底仿佛入夜的天穹，其上无数釉斑随着观者移动脚步而变幻七彩光华，短短数十秒间，瑰丽奇异的观感竟似遥望星空一般。  
　　一卷《汉书·扬雄传》让我驻足许久。现存《汉书》最早刻本或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宋刻递修本，而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汉书》写本则在国内早已不存，因此这卷由初唐时人精心抄写的《汉书·扬雄传》堪称至宝。此卷今存26页纸，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多用楷书，兼用行楷，字体俊逸，颇有欧阳询书风。由于该卷抄写年代几乎和颜师古注《汉书》同时，因此可以说真实展现了《汉书》乃至中国传统史部经典的早期面貌。这卷《汉书·扬雄传》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传承近300年后，公元948年，出身于当时日本第一豪族的藤原良秀曾在卷上用朱笔句读、墨笔训注，无形中又让其增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价值。此卷直至现代仍由私人递藏，近年才成为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藏品，此番公开亮相更成为一些日本文化媒体重点关注的报道对象。  
　　大展第三期上，还有保存于京都大德寺的一组《观音·猿·鹤》难得出陈。这是三幅巨型绢本立轴，墨笔淡彩，据说是南宋四川画僧法常的代表作。这三轴居中为观音坐像，两侧分别为一只仰天长唳的丹顶鹤与长臂猿母子。据说葛洪在《抱朴子》里记载周穆王南征时，战死沙场者，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变作虫沙。庾信在《哀江南赋》里也曾感慨“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画家以此典故绘制的这组作品，笔墨爽利，气韵高致，委实蕴含着悲天悯人的大德情怀。法常自号牧溪，在中国画史上似乎名声不彰，元代收藏家庄肃说他的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甚至有人说他“粗恶无古法”。但牧溪的许多作品在元明时代被带到日本，成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作家川端康成曾说，“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  
　　谈到不同于中国的日本，最好的概括也许出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她在《菊与刀》一书中曾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通过梳理日本国宝大展中的中华文物，不难发现其制作年代大体集中于隋唐、宋元两个时间段，前者雄强华美，后者清幽雅丽。它们被引入东瀛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做法，是将这两种审美特质各自演化到极端，结果便是变雄强为暴烈，化清幽为阴翳，从而对日本传统精神风貌发生了影响，也因而会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它们熟悉却又陌生，或许正因为如此复杂的魅力，才吸引我漂洋过海来看展。  
　　2017年11月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隆重面世，面向全球发行，在国内掀起了持续阅读学习热潮，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热议和点赞。这是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后，又一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本。翻开这部经典著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理论品格跃然纸上，散发出耀眼的真理光芒和无穷的思想魅力。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理论的引领。党的十九大一个突出亮点和重大历史贡献，就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这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高擎这一伟大思想火炬，就是要照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凝聚起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一 新时代催生新理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进入新时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深刻变革的发展阶段、勇气非凡的自我革命，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世情呼唤新方案。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当代中国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身处新时代，世界这么变，中国怎么办？面对世界局势的复杂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如何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强定力，如何在稍纵即逝的机遇中赢得“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战略主动，迫切需要给出新的解决方案。  
　　新事业呼唤新指南。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也带来了许多“成长的烦恼”。我们告别了缺衣少食的短缺经济，却又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困扰；“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可“中国创造”才刚刚破茧而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面对事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期待，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保持强劲发展动力，如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迫切需要给出新